

中国文化史纲

冯天瑜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葛钢

封面制作：张静



欢迎登录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网站
<http://www.blcup.com>

ISBN 978-7-5619-0673-6



0 1 >



定价：12.00元

中国文化史纲

冯天瑜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史纲/冯天瑜著.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7 重印

ISBN 978-7-5619-0673-6

I. 中…

II. 冯…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书 名: 中国文化史纲

责任编辑: 陈 辉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48 / 3591 / 3651

编辑部 82303647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 / 3908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彩插: 2

字 数: 137 千字 印数: 12001—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19-0673-6 / G·104

定 价: 12.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82303590



▲商母丁簋



▲秦始皇陵从葬兵马俑军阵

目 录

导言	(1)
一、“文化”界说	(1)
二、“中国”界说	(2)
三、中国文化的生态状况	(4)
四、中国文化的特质	(10)
第一章 创榛辟莽(从人猿揖别到夏禹传子)	(14)
一、元谋人、北京人:中国文化史的首轮主角	(14)
二、农业革命	(16)
三、父权兴起	(18)
四、精神之花初放	(19)
五、原始宗教	(22)
第二章 文明初兴(夏、商、西周)	(25)
一、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25)
二、青铜时代	(27)
三、甲骨文与金文	(28)
四、巫、史、祝、卜	(30)
五、崇帝尚鬼与敬天法祖	(31)
六、宗法建构与制礼作乐	(32)
第三章 多元私学(春秋、战国)	(35)
一、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门”	(35)
二、“士”的崛起	(37)
三、诸子争鸣·和而不同	(39)
四、文化域分	(44)

五、重民轻神与民贵君轻·····	(48)
六、元典的订定与发扬·····	(50)
第四章 一统整合(秦、汉)·····	(55)
一、“一天下”与书同文、行同伦·····	(55)
二、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58)
三、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	(60)
四、边患·长城·丝路·····	(62)
五、佛教东来与道教创立·····	(65)
六、天算·地学·医学·司南·造纸术·····	(67)
七、宏阔的文史创作·····	(69)
第五章 乱世裂变(三国、两晋、南北朝)·····	(72)
一、社会动荡与名教危机·····	(72)
二、玄学·清谈·····	(74)
三、文学自觉·····	(75)
四、佛教华化与道教融汇儒佛·····	(77)
五、汉胡大交会·····	(79)
第六章 盛代强音(隋、唐)·····	(85)
一、两都营建与运河开凿·····	(85)
二、贞观之治·····	(88)
三、三教共弘·····	(90)
四、科举制度·····	(91)
五、律诗极致与书画尽美·····	(93)
六、古文运动与史学成就·····	(96)
七、汲纳异域与泽被东西·····	(98)
第七章 精致内敛(五代、两宋)·····	(104)
一、集权与右文·····	(104)
二、学校与书院·····	(107)
三、儒学复兴与理学建构·····	(108)

四、宋词与文士雅趣	(113)
五、市井风采	(116)
六、科技华章	(118)
七、文运南移	(123)
第八章 朔方冲击(辽、西夏、金、元)	(127)
一、汉人的退守与游牧人的攻势	(127)
二、征服者被征服	(129)
三、大哉乾元	(132)
四、杂剧与科技	(135)
第九章 垂暮新变(明至清中叶)	(141)
一、专制文网	(141)
二、八股·心学·异端	(144)
三、明清之际的非君思潮	(147)
四、“下西洋”与“海禁”	(149)
五、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151)
六、学术集成	(154)
七、小说丰收	(157)
第十章 转型时代(清末至五四运动)	(160)
一、开眼看世界	(160)
二、近代文教设施	(162)
三、新知识分子	(166)
四、体用之辨	(168)
五、从“维新”到“革命”	(170)
六、习俗转化	(174)
七、“德、赛两先生”	(177)

导 言

在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间，人类栖息的地球发生了伟大的事变——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先后涌现出一批独立创制文字和金属工具的人群，人类终于走出长达百万年的蒙昧时代和长达万年的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的门槛，赢得历史进展的加速度。

在此后数千年间，诸文明民族创造的文化，生灭消长，此伏彼起。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化，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希腊文化，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化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东亚大陆崛起的那一支文化，也即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国文化，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绵生发，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与那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化”（如苏美尔文化通过巴比伦、希腊、罗马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化）迥然有别。

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东方之谜”，引起世人注目；而中国人自己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去探求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的奥秘。

一 “文化”界说

中华先民很早就产生对于“文化”的精辟认识。成文于战国时

期的《易传》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文”字，从纹理义演绎而来，“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秩序。以“人文”“化成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界，便是中国古哲赋予“文化”的内涵，它已相当逼近现代学术界所揭示的“文化”的本质意蕴——“人类化”、“自然的人化”。

文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人类实现“自然的人化”，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主体心智的塑造，因此，文化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部类。

技术体系表现为文化的器用层面，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

价值体系表现为文化的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缙蕴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化的精神内核；

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的，是文化的制度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

还有文化的行为层面，即人类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

本书所要探究的“文化”，涉及器用、制度、行为、观念诸层面，其重点则在观念层面。观念文化记录着人类累代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内容，是不停流逝的广义文化的摹本。

二 “中国”界说

文化既是一种人类现象，它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化同时又是一种民族现象，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化千差万别。我们将要论及的“中国文化”，约指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发的自成一格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内涵不断拓展。

在先秦，“中国”或指京师，与“四方”对称⁽¹⁾；或指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地段，与落后的“四夷”对称⁽²⁾。

隋唐以降，“中国”指定都中原的王朝；元代自称其统治区域为“中国”，称邻国（如日本、高丽、安南等）为“外夷”⁽³⁾，明清沿袭此说。

总之，“中国”这一概念在古代虽不断演化，但其主旨却始终守住一个“中”字——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这既是一种地理学的中心意识，更是一种文化学的中心意识。这种文化中心意识，还表现在“中华”一词上。“华”指文化繁盛，“中华”意谓居于中心的富有文化的民族。时至近代，中国人的中心意识渐次淡化，而余韵流风仍然不时回荡。

中国版图在历史上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确立中国领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约 1260 万平方公里。19 世纪中叶以降，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陆地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

历史上曾经在中国范围内居住活动的民族，除月氏（音肉支）族的主体在公元前 2 世纪迁往中亚以外，其他各族都没有完全离开过中国。由华夏族演化而成的汉族在中国多次建立政权，此外，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曾建立过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和满洲还统治过整个中国。但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建立的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都是多民族国家。

今日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汉族及 55 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

三 中国文化的生态状况

中国人古来之所以长期自认处于世界中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孕育的生态状况颇有干系。

文化生态由自然场与社会场交织而成。“自然场”指人的生存与发展所附丽的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社会场”指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分为经济层与社会层。此外,文化的民族性和国度性决定了它要受到特定的国际条件制约。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应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四方面加以整合。

(一)地理环境

对中国地理大势首次作出概括的,是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汉代人将其收入《尚书》)。该文提出华夏族的“四至”观: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这一洗炼的描述当然需要补充:中国东边面临的大海,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太平洋,并非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其陆地外缘,不仅有西北横亘的漫漫戈壁,还有西南耸立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纵贯边陲的横断山脉。大海、沙漠、高山共同围护着板块状的东亚大陆,使之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而其内部,又有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气候条件繁复的特点,从而为文化的多样发展、文化中心的迁徙转移提供条件。

东亚大陆的地理格局,是中国文化独立发生,并在以后漫长岁月中能够保持一以贯之的统系的原因之一。

(二)经济土壤

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发展,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

人与自然呈双向交流关系。一方面,人的活动依凭自然,受制

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也即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器用文化,既是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为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生长发育奠定基础。

绵延久远的中国文化大体植根于农耕与游牧这样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温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前者被人们开辟为农耕区,养育出一种以定居农业作基石的,礼制法规齐备、声明文物昌盛的农耕文化;后者则成为游牧区,繁衍着无城廓、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骑战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汇,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的一大主题,中国人自先秦直至明清反复论及的“华夏(农耕人)夷狄(游牧人)之辨”正是这一主题的展开;而东起海滨,西极大漠的万里长城,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边际线,多少历史壮剧在这里演出!

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还有中原定居农耕方式与南方山地游牧方式两种类型差异。南中国亚热带山地民族(如苗、彝、黎、高山等族),直到近古甚至近代,仍然刀耕火种,迁徙无定,但移动范围大体在南方山地之内,与中原农耕人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故这两种经济方式间不像游牧与农耕那样彼此征战不息。历代中原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设官治理,推行羁縻柔远政策,偶尔伴之以武力镇压。

在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其间又分为两大段落,一为殷商、西周的土地国有(王有)及村社所有、集体劳作阶段。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卜辞。“协”字像三耒并耕,是殷代庶众在王田共耕的写照。《诗·周颂》则多次出现“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字句,说明西周普遍实行在“公田”上的集体耕作。二为东周至明清的土地私有、个体劳作阶段。自春秋、战国开始,土地国有(王有)、私有并存,而私

有渐居主导,土地逐步可以自由买卖,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的小农业自然经济构成主体,“牛郎织女”的故事便是其典型化摹写。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广阔而坚实的基础,正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与此相辅相成的地主—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构成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完整结构。

如果说,在土地私有、集体生产的农村公社—领主经济的土壤中养育出殷商西周神权至上的官学文化,那么,在土地地主—自耕农所有、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则培植了晚周虚置神权,以人文为研习重点的私学文化,两汉以后又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汇佛道的帝国文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大规模东渐,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以商品经济为动力源的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更新的土壤。

(三)社会结构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化。

人类社会组织演变趋势,大约是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进化。希腊便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典型。然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虽发生过诸多变迁,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却长期保留,这与中国人的主体从事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有关,使得中国跨入文明门槛以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很不充分。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

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则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人梁启超所说：

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⁴⁾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⁵⁾。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

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206年,秦王嬴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余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⁶⁾。

“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

(四)国际条件

跨入文明门槛以后,截至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涌入以前,建都中原农耕区的王朝,其文明水平一般都高于周边四夷,因而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称四夷为“陋”⁽⁷⁾。处于文化“高势位”的中原人长期认为,只有华夏文化施影响于夷狄,而少有逆向影响,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⁸⁾。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中原王朝被武功强悍的周边游牧人击败的事例,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并未出现危机,文化发达的中原人一再使野蛮的征服者被征服——凡是进入农耕文化圈的游牧人,经过一代或数代,无不“汉化”,便是雄辩的例证。

由于中国文化在古代明显领先于周边地区,所以中国虽然广为吸收周边文化成果,但主要是中国文化施影响于周边。汉字、儒学、礼法、农业及手工业技艺,都是中国输往周边的文化品种,以至日本、朝鲜、越南等被纳入“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秦汉以迄明清诸王朝无论是与中亚、西亚交往,还是与东邻日本以及南洋诸国交往,都有一种“天朝上国”俯视夷狄的意味。汉代“凿空”西域的张骞、班超,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无不胸藏“宣威异域”的恢弘气

魄，究其底蕴，盖在国力强劲，文化昌盛。

古代中国的邻邦，其文明水平较高者是印度。但由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阻隔，中印之间经济往来、人员交流不多，但南亚的佛教文化经由印、中僧人的努力，得以北传，对两汉以降的中国文化发生深刻影响。不过，佛教文化在影响中国的同时，又被中国人所吸纳消化，魏晋隋唐以降，佛教日渐中国化，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将佛学与易学、思孟学交融互摄，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士人欢迎的形态；两宋以降的一批儒者，在坚持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广为吸收佛学思辨成果，创建新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化的佛教与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构成中古及近古中国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综观古代中国，虽然面对过足以改朝换代的异域军事力量的袭来，也曾迎受过佛学那样高水平的观念文化的传入，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发生过动摇。然而，时至近代，情形发生重大变化——被近世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殖民者梯海而至，荒渺遥远的“泰西”一变而为近在咫尺的威胁。西洋人用大炮、鸦片和商品，打破中国自古形成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壁，将中国纳入世界文化的总流。李鸿章在 19 世纪中叶痛陈中国亘古未遇的严峻形势：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⁹⁾

这就揭示了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新特点：第一，昔日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现在则转移为从东南沿海登陆的西